第一章　抗日反蒋的两广事变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抗日战争，从广义上说，是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到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结束，历时14年。其中又从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为局部抗战，后一阶段为全面抗战。广西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没有直接参加局部抗战；人们所说的抗日战争，是七·七芦沟桥事变后的8年抗战。

全面抗战的前一年，发生了两广事变，对全国的政治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也直接关系到广西抗战的思想发动和组织准备。所以，广西的抗日战争历史，应当从两广事变写起。写两广事变，得追溯一下蒋、桂的历史关系。

第一节蒋、桂矛盾的由来和发展

新桂系是以桂籍人士为主体的军事、政治集团，代表着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它是从陆荣廷旧桂系中脱胎出来的。新桂系的领袖和骨干大多在陆荣廷的桂军中充任中下级军官，李宗仁是林虎部下的营长，黄绍竑、白崇禧、黄旭初等是马晓军模范营的连、排长。这批人不同于旧桂系将领出身于游勇绿林，而是有一定文化知识、受过军事教育、参加过辛亥革命北伐援鄂、有爱国热情、思想比较新颖。

1921年孙中山命粤、滇、赣各军入桂讨陆，旧桂系迅速解体，陆荣廷等亡命省外，其残军败将散匿各处，据地为王，自称自治军，反对孙中山的军政府。在自治军蜂起的混乱的局面下，李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仁据玉林为地盘，黄绍竑、白崇禧向梧州发展，然后两部联合，构成新桂系初期的基本队伍。在李济深粤军的支持下，新桂系连横合纵，把大小军阀各个击破，于 1925 年统一广西。李、黄、白参加了国民党，把广西置于广州国民政府领导下，实现两广统一，执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1926 年广西部队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李宗仁为军长，率主力 1.5 万人北伐；黄绍竑任党代表兼广西省主席，留守后方；白崇禧调任北伐军副总参谋长，协助总司令蒋介石指挥作战。桂军出师北伐两年，转战湘、鄂、赣、皖，一直打到山海关，打跨直系军阀吴佩孚，东南军阀孙传芳，奉系军阀张作霖，战功卓著，名声鹊起，获得“钢军”之称。随着势力的膨胀，新桂系积极参与政治活动，追随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宁汉分裂，新桂系站在蒋介石一边，对武汉用兵。宁汉合流后，新桂系填补政治真空，一度把持着国民党的中央权力，成为现代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重要派系。

1928 年国民党的势力及于华北之后，形成了四大派系：第一集团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蒋自兼总司令，有 20 个军，4 个独立师，约 50 多万人，控制着江、浙、赣、皖 4 省。第二集团军是西北军，冯玉祥为总司令兼开封政治分会主席，拥有 10 个军，8 个独立师，约 42 万人，控制着陕、甘、豫、鲁 4 省。第三集团军为晋系部队，阎锡山为总司令兼太原政治分会主席，拥有 30 万军队，控制着晋、冀、察、绥 4 省。第四集团军是桂系部队，李宗仁为总司令兼武汉政治分会主席，拥有 7 个军，20 多万军队，控制着两湖和广西。此外，还有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刘湘，湖南的何健，东北的张学良等大大小小的地方实力派。其中以蒋介石的实力最大，他掌握着国民党中央党政军大权，有江浙财团支持，有英美帝国主义做后台。蒋以领袖自居，要各派系“归命中央”，企图削去各集团军番号和军分会，召开善后会议和军队编遣会议。蒋介石采取厚阎、薄冯、抑桂的策略，从中挑拨离间，各派为保住

军队和地盘，明争暗斗，相持不下。会议解决不了问题，就诉诸武力。

蒋介石先向桂系开刀。因为 1927 年冬，新桂系曾迎汪（精卫）联何（应钦），逼蒋下野取而代之；且四集团军的将领反蒋情绪激烈，是蒋最危险的敌手。李济深领导两广地区，蒋也把李划入桂系之列。而桂系主力驻扎在湖北，居长江中游，对南京、上海威胁最大。蒋更看到，桂系几十万军队摆在广西、武汉、津沽三点一线上，相去数千里，有弱点可资利用。因此 1929 年上半年爆发了蒋、桂战争，蒋介石第一步利用武汉军分会不经请示免除湖南省主席鲁涤平之事，下令讨伐桂系，宣布开除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的国民党党藉。第二步，欺骗李济深入京调停，扣留于砀山，收买李部下陈铭枢、陈济棠投蒋，拆散粤桂同盟。第三步，派唐生智到天津策反其旧部，迫使白崇禧弃军逃命。第四步，通过俞作柏策动第七军将领李明瑞、杨腾辉阵前反戈，不战而取武汉。第五步，命令陈济棠粤军、何健湘军攻入广西，将李明瑞、杨腾辉的部队南运回桂，压迫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亡命海外，然后以俞作柏为广西省主席，李明瑞、杨腾辉为广西编遣区正副主任，收拾桂局。

不到半年，新桂系惨淡经营的地盘和军队全部丢光，但是李、黄、白不接受失败，自知在广西和桂军中还有影响，所以他们等待局势变化卷土重来。果然不出 3 个月就碰上机遇，1929 年 9 月，俞作柏、李明瑞受汪精卫策动，在南宁通电反蒋，蒋介石也用收买其部下的办法，使俞、李迅速失败，遂任命吕焕炎为省主席，杨腾辉为广西编遣区主任。吕、杨自觉资望浅薄，没有力量，不敢就职。李、黄、白于 11 月间潜回广西，迅速收编部队，迎接汪派张发奎部队从鄂西来桂，共同组成护党救国军，两路攻粤，受挫退回广西。1930 年 1 月，粤军追入广西，占领梧州、玉林，在北流大败张发奎、黄绍竑军，粤桂两军遂隔着浔江对峙。与此同时，

蒋军朱绍良部侵入平乐，在荔浦被白崇禧打败，退下梧州与粤军会合。在军阀混战之际，中国共产党领导了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立红七军、红八军，开辟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这次桂系东山再起，夺回了广西地盘，重建了军队，但桂东南财富之区被蒋、粤军所占，桂西则是红色区域。

1930 年 3 月，阎、冯、桂联合反蒋，桂系为策应中原大战，准备进兵武汉，与阎、冯会师。桂系下了破斧沉舟的决心，决定放弃广西，倾巢入湘，直冲武汉。当年 6 月，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领兵先行，通知黄绍竑收集队伍跟进。前军入湘锐不可挡，连下衡阳、长沙、岳阳，进入湖北。可是后队行动缓慢，衡阳被粤军攻占，把桂军切成两段。李、白、张被迫回师攻打衡阳，军疲城坚,一败涂地,狼狈逃回广西。张军 1 万多人减员到 1000 多人，翌年借故离开广西。黄绍竑悲观失望，脱离桂系投蒋。粤军重占梧州、桂平、贵县。龙云派滇军数万占据左、右江，围攻南宁。处此存亡续绝之际，李宗仁重整队伍，团结军心；白崇禧奋力一战，把滇军逐出桂境；黄旭初沉着刚毅，保住南宁危城，桂系苦撑着广西的半壁江山。

连续两年的蒋、桂之战，尽管有是非曲直之分，有操守优劣之别，但同属新军阀，进行权力和地盘的争夺，给人民带来了灾难，无进步性可言。

1931 年中国发生两件大事，对新桂系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第一件是蒋介石囚禁胡汉民，粤方为了扩大反蒋力量，主动从广西撤军，拉拢桂系结盟，桂系也求之不得。后因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被迫下野，宁、粤重新合作，而两广联盟仍在。 1932 年初两广实力派另立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

南政务委员会①，奉胡汉民为领袖，两广保持着半独立状态，新桂系赢得 6年的偏安局面。它总结过去的失败教训，抓住机遇，锐意经营广西，制订“三自”（自卫、自治、自给）、“三寓”（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政策，颁发《广西建设纲领》，提出“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口号。桂系最得意之作是大办民团，轮训全省壮丁达 120 万人，积存了庞大的兵源。对初中以上学生和公务员实行军训，造就了约 10 万名预备役下级军官和军士。另外健全乡、镇、村、街基层组织，举办各种军、政、民团训练班和学校，招收知识青年入学，毕业后派充乡、镇、村、街长，兼任国民学校校长和民团队长，实行“三位一体”；这些人忠于李、白，卖力推行“三自、三寓”政策。其次是加强军备，把常备军裁减到 17个团 2万多人，腾出军费建立空军，逐年购进外国武器，创办各种兵工厂，制造武器弹药，其中柳州飞机修理厂规模最大。在经济建设上值得称道的是公路建设，提高原有 2000 多公里公路的质量，增建 1000 多公里的新路，初步形成了省道、县道、乡村公路的网络；还创建了几个省营工厂、矿山和农林试验场。在教育方面也很有成绩。新桂系在几年时间内埋头苦干，把贫穷落后的广西治理得颇有条理，把“一盆散沙”的中国人实行了军事化，使中外人士刮目相看，称广西为“模范省”。新桂系加强军事力量，无疑是为了反蒋、防共，巩固对广西的统治，以便问鼎中原，但也为后来的抗日战争作了组织训练群众、积蓄战备力量的准备。

1931 年第二件大事是爆发九·一八事变，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到主要地位，引起国内阶级关系的重新调整，给蒋、桂矛盾注进了新内容。在对待日本侵略的问题上，以粤桂为一方，南京政府为一方，出现了明显的对立。

①当时文献说的“西南当局”，是指这一部、一会，管辖广东、广西，不包括云南、贵州。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从言论上看，新桂系是国民党中的抵抗派。1933 年，李宗仁提出著名的“焦土抗战论”。他说，所谓焦土抗战，并不是把国家人民的财富付之一炬，而是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悲壮口号激励人民起来抗战。在敌强我弱、敌长于速战速决的情况下，我要利用广土众民、山川险阻的优势，实行清壁坚野，节节抵抗，进行长期消耗战，并发动敌后游击战破坏交通，陷敌于泥沼中，年深月久，暴日必败①。焦土抗战论是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的批判。1936 年 4月 18 日，李宗仁在广州对记者发表《论中日问题》的谈话，他认为中日战争不可避免，从两国政治、军事、经济、国际条件诸因素分析，得出“我不独无战败之理由，而战后之胜利必属于我”的结论，谴责南京政府“非至最后关头决不轻言抗战”的论调，是“宁忍屈辱”②。白崇禧出了一个《演讲集》，关于抗战的论说也很多。

在支持抗战的实际行动上，新桂系也同蒋介石针锋相对。一·二八上海抗战，南京政府坐视不救，拒绝援助十九路军，压迫中国军队撤退，签订屈辱的《上海停战协定》。两广当局极力主张援助十九路军，并派空军到杭州参战，通电谴责停战协定为“卖国”。1933 年 5 月，冯玉祥在察哈尔组织抗日同盟军收复失地，蒋介石却派 15 万军队，配合日军两面夹攻将它瓦解。李宗仁、陈济棠通电指责蒋“既不自行抗日，又不许他人抗日，岂欲将抗日力量消灭以博取敌人快意耶？”③ 李、白、黄还给抗日同盟军汇去 10 万元洋银作军费。冯玉祥感动地说：“谁都知道广西的军队是最困难的，他们能这样慷慨好义，就是表现了他们的真正爱国”④ 在对待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上，唯独两广不执行国民政府颁布的

①《李宗仁回忆录》下册 683页。
② 广州《民国日报》 1936 年 4 月 8 日。
③ 刘治平编《反蒋运动史》 616 页。
④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 43—44 页。

《睦邻敦交令》。当时外省人士乘船到梧州，岸上“抗日救国”4个方丈大字赫然映入眼帘，走到哪里，都看到学生晨呼，壮丁操练，宛如进入一个民气沸腾的世界。在广西，可以发表抗日言论，有集会、结社、游行的自由，当局还支持群众抵制日货运动。著名爱国人士章乃器撰文说：“在西南事变发生前的广西民众运动，虽然不能适合我们的理想的标准，然而至少是有相当的基础的，对于青年的压迫和思想束缚，广西可以说是比国内哪一处都比较的开明①。”

很显然，九·一八以后桂系反蒋，既反对蒋介石独裁乱纪，也反对蒋介石对日屈辱投降，抗日和反蒋已经结合在一起了。

但是矛盾的现象却令人费解。1935年日本策动华北自治的同时，也企图运动华南抗蒋独立，前后派遣侵华急先锋冈村宁次、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等军政经人员，以“中日亲善”“经济提携”为名，频频访问两广，特务头子土肥原曾两次到南宁。桂系也接受日本的军事援助，包括5000支步枪、几十挺机枪、10多架飞机和几十名陆军、空军教练。这岂不是同他们呼吁抗日相刺谬吗？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并不讳言，曾接待过近百名日本访客。但他说是利用此机会做日人的工作，说自己痛斥日本侵略，指出侵华的利害关系，曾说服了某些访客，争取一个翻译给我方送情报②。白崇禧则正面回答接受日援的原因，他说：“中国一切落后，特别是军事总不及人，所以要聘请日本人来帮助我们。……我们将来可以利用日本人代我们训练的陆空军和向日本买来的武器打日本，正合我们广西的俗话：‘借他人的拳头来打他人的嘴巴’③”。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发现新桂系在对日关系上有损害国家利益的

① 章乃器“西南事变给予我们的教训”载《救亡情报》1936年7月26日。

②见《李宗仁回忆录》下册，685～688页。

③阙宗骅“陈济棠统治广东时期与新桂系的关系”，载《陈济棠史料专辑》第2辑。

事实证据，抗日战争的实践也兑现了白崇禧的解释。但在大敌当前、全国人民义愤填膺的时候，不管出自何种动机，同仇敌明来暗往，政治影响是很坏的，也授人予“勾结日帝”的口实。

第二节　两广事变的发动和陈济棠失败

1936 年初，华北警报频传，日急一日。华南沿海亦是多事之秋，日人到处挑衅，在汕头、厦门制造事端，威迫当局“缉凶，，、赔偿。日本海军企图占领南澳岛为南侵基地，诱迫居民迁往台湾。广州学生首先响应北平学生一·二九爱国运动，举行示威游行，成立全市学生救国会，派宣传队分赴各地发动，通电发表对华北局势的声明。南宁、梧州、桂林学生也迅速举行援助一·二九大会，会后游行示威，向广西当局递交请愿书，要求南京政府外交公开，讨伐冀东伪组织，释放被捕学生，并成立了全省学生救国联合会。

正在这时，1936 年 1 月 15 日，胡汉民从欧州回国，立即同两广军政要员连日商谈时局。胡汉民、李宗仁、肖佛成、邹鲁等写文章，发表谈话，谴责蒋介石政府的卖国、误国政策。 4 月底，上海救国会领导人、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到广州谒胡汉民、李宗仁，陈述救国会的主张，胡、李非常赞同。救国会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定战友，在全国具有重大影响，救国会的主张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立场。李宗仁邀请并陪着陶行知到梧州、南宁，向党政军学工妇各界演讲《中华民族的解放道路》，连讲 16 场，听众逾万，十分感人。白崇禧当即起立表示：“非常同情上海及平津各地受恶势力压迫摧残的青年学生，深信民众力量的伟大，时势所趋，潮流所向，将来必能扩大，完成我们民族革命的伟大事业”[①]。上海文

① 引自陈大文“桂系与救国会的关系”，载《南宁文史资料》 1988 年第 1 期第 3 页。

化界救国会刊物《救亡情报》载文指出：“西南当局的表示，是一·二九以来民众救亡运动的直接效果。半年来抗日战士奔走呼号，我们的主张终于得到了中国一大实力派的公开赞同①。”

两广当局不断揭露抨击蒋介石对日妥协退让政策，抵制国民政府的货币统一，抵制国民党第五届代表大会，俨然成为南方的反蒋中心。蒋介石非常恼火，早就下决心解决两广问题，但是严峻的形势又不允许他动手。因为北方日本步步进逼，南方红军迅速壮大，他要倾注全力进剿，还要拉拢两广出兵剿共。特别是胡汉民德高望重，伤害了他会重蹈 1931 年的复辙，故蒋介石忍气吞声，多方拉拢胡汉民，选胡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虚位以待，但胡汉民不买账，宁愿住在广州，也不愿进京与他合作，蒋对之无可奈何，只得容忍两广保持独立状态。两广实力派也知道，蒋亡西南之心不死，过去有江西苏区作缓冲，红军长征后，蒋的势力扩张到闽、赣、黔等省，威胁着两广。蒋军追击红军进入西南时，乘机削弱异己，竟把送行的贵州省主席王家烈捉上飞机，以薛岳取代。1935 年粤汉铁路通车，给蒋用兵两广提供了方便。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感到危机逼近，赶在蒋的前头，把胡汉民迎到广州，作为旗帜。

哪知道胡汉民 5 月 12 日脑溢血突然逝世，两广顿失凭借，蒋介石的障碍消失了。次日，蒋即电陈济棠派其兄陈维周到京晤谈。蒋告诉陈：中央准备对桂用兵。陈并获悉南京政府解决西南三大原则：1. 彻底解决广西，由中央协助广东出兵；2. 驱逐肖佛成等反蒋元老离粤；3. 广东仍维持原来局面②。蒋介石这一动作，明显是收买陈济棠，拆散粤桂联盟。但陈济棠知道粤桂唇齿相依，蒋

① “我们对于西南事件的认识和态度”，原载上海《救亡情报》，1936 年 6 月 20 日《南宁民国日报》转载。

② 《李宗仁回忆录》下册 664～665 页。

借刀杀人，逐个吃掉，便把这一情报告诉了桂系，表示决不因胡汉民逝世而变更以前主张。5月20日，奉蒋命到广州吊丧的王宠惠提出“宁粤团结”的五项条件：1. 取消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2. 改组广东省政府，省主席林云陔调京任职；3. 在西南执行部和政委会工作的负责人愿到京工作者，中央将妥为安排，愿出国者给予旅费；4. 陈济棠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改为第四路军总指挥，军师长由军委会重新任命；5. 统一币制①。这几条故意不提广西，是为了逼陈济棠交出广东的政权、财权，把“南天皇”变成蒋介石手下一员将领，这就将陈济棠逼上梁山。与其束手待毙，不如先发制人，但陈对胜负成败没有把握，忧心如焚。陈氏兄弟生长在边疆农村，从小受封建迷信思想熏陶，遇到难解决的事就求神卜卦。据传有个星士叫翁半仙，写了两句模棱两可的乩语：“蒋倒人去，机不可失②。”陈维周也窥看了蒋介石的相，过不了今年，这更坚定了陈济棠的必胜信心。至于李、白向来以反蒋著称，李宗仁长期留驻广州，就是为了做陈济棠的工作。现在陈既带头反蒋，尽管李、白认为时机不适当，为了共同命运，也得支持。两广军政要员经过10天紧急磋商，统一了思想，以请求中央政府领导抗日为名，派兵北上抗日，如果蒋介石拦阻两广军队北上，他就自绝于全国人民。并遣使四出联络华北的宋哲元、韩复榘、阎锡山，西北的张学良、杨虎城，西南的刘湘、龙云。湖南地居北上要冲，派李品仙去联络何健，何表示桂军到达长沙才能行动。

6月1日，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呈文。文曰：

连日报载，日人侵我愈亟，一面作大规模走私，一面增兵平

①程思远《政坛回忆》第77页。

② 据台北《广西文献》第10期，刘昭晴“读再谈六一运动后”一文说，当时有“蒋倒人去，机不可失”两句，因蒋是胜利者，前一句对他不敬，人们只传后一句。

津，经济侵略，武力侵略，同时迈进。瞻念前途，殷忧遏极。属部属会等以为今日已届生死关头，惟抵抗足以图存，除全国一致奋起与敌作殊死战外，则民族别无出路。在昔我中央尚依赖国联，而国联之处我如何？尝屈辱图存，而屈辱之效果如何？今敌人又加紧侵略矣。中央忍辱负重之苦心，国民非不谅解，惟和必有方，忍必有期，长期因循，则敌人无餍之求日甚一日，得陇望蜀，岂有穷期。呜呼！九·一八之创痕未复，一·二八之血腥犹存，辽、吉、热、黑四省之同胞，陷于敌人铁蹄之下，已愈五载，今平津又将继之矣。昔人有言，以地事人，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国家之土地，先民所遗留，亦民族所托命，举以资敌，宁异自杀。属部属会，以为黄河以北，寸土不容予人。切冀中枢毅然决然，从事抗战，用以至诚，吁请钧府钧部，领导全国。矢抵抗之决心，争最后之一着，国家不亡，公理不诬，则奋起景从者，则不仅属部属会也。时不待我，惟实利图之。迫切陈词，伺候明教①。

同一天，白崇禧在南宁举行的广西党政军联合扩大纪念周会上，作“抗日救国”讲演，宣布两广敦请中央领导抗日，并说：“过去一切旧帐应该一笔勾销，今后中国人不应该再打中国人，重新联合起来，向日本帝国主义者奋斗拼命②。”6月2日，西南一部一会向全国通电，呼请各界督促中枢领导抗日，称为“冬”电。6月4日，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率领陆海空三军68名将领发出请缨抗日“支”电，请求“迅予改颁军号，明令属部北上抗日”③。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委员立即授予“中华民国革命军抗日救国军”军号，颁发印信，两广部队仍用第一、第四集团军番号。

两广的国民党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立即动员民众响应。在广

① 《李宗仁回忆录》下册670—671页。
② 《白崇禧演说集》1936年6月1日讲演“抗日救国”。
③一、四集团军将领请缨抗日支电，载《广西抗日救国重要文电汇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州市，举行了有 10 多万群众参加的反日大示威，议决“停止一切内战”、“即时对日宣战”，会后列队到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委员、第一集团军总部请愿。在广西，6月 1 日，中共南宁县委以“广西抗日同盟会”的名义发表“拥护抗日宣言”，提出召开国民会议、产生国防政府、释放政治犯、没收日货和汉奸财产、对日宣战、组织义勇军、实行公开外交、增加工资、取消苛捐杂税等 10 项主张。4 日，南宁市举行 4.5 万人的抗日救国集会和游行，桂林、梧州也举行空前的抗日大示威，参加人数达 10 万。文化界、妇女、工人等救国会组织相继成立，并联合组成广西全省各界救国会，以著名爱国人士马君武、李任仁为领导。广西学生表现出高昂的爱国热情，争先报考广西抗日学生军大队（中共党员谢和赓建议白崇禧成立,名额 300 人),成立时举行有 2 万多学生参加以誓师大会，开赴湘桂黔边宣传抗日。全省有 40 多所中等学校组织宣传队，爬山涉水，深入偏远村寨向民众宣传抗日。

全国各地学生陆续罢课，上海、北平、汉口乃至南京都举行抗日大游行。中华全国学联表态拥护西南“冬”、“支”两电，赞同第四集团军动员令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号召全体民众监视西南兑现它的抗日主张。

在人民的支持下，陈济棠、李宗仁两次拒绝日本驻穗总领事的抗议，明确表示民众的抗日情绪不能制止。这是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当局敢于对日本的无理要求作出强硬的答复，得到国人的赞赏。

6月 9 日，第四集团军下动员令，宣布广西立即与日方继绝关系，取消一切辱国条约；本军北上唯一目的是抗日，反对内战；一切军队不分党派，凡愿意参加抗日的，一概欢迎；北上军队坚决与企图阻止北进的卖国贼决斗。粤桂军 4 个师即分道开进湘南。

老于内战的蒋介石，表面上故装镇定，暗中命陈诚用火车赶运 3个师入湖南,于 6 月 10 日抢占衡州，堵住了粤桂军北上道路，

并威慑了何健。9 日，蒋介石在中央纪念周会上否认曾向西南提出过 5项条件，声称准备召开国民党二中全会，请两广同志共商大计。同时以中央名义发出“佳”电，重申二中全会即将召开，一切均待决于党议，要两广服从中央命令，北上部队调回原防。蒋介石威胁陈济棠说，若不中止自由行动，是为地方将领抗命之佐证。西南一部一会发出“真”（11 日）电予以驳斥，指出：“中央若果有御侮决心，则日本正在华北增兵，何以不见中央向北开动一兵一卒。……反欲一面以召开全体会议搪塞全国人民一致抗日之要求；一面调集重兵压迫湘粤桂之四境，是对外之实效未图，而内战之危机先启”①。同时请中央指定两广部队的北上路线和集结地点，接济饷糈械弹。在电战中，两广对蒋党中央的攻势虽然凌厉，但蒋介石提出召开二中全会解决问题的主张却有很大欺骗性。冯玉祥、李烈钧、龙云等电劝陈、李、白要相信蒋介石，参加二中全会解决争端。其他地方实力派慑于蒋的淫威，或被蒋拉拢过去，没有一个敢公开支持两广的。

蒋介石又组织舆论反攻，指使中央、武汉、北平 6所大学校长，联名致电国民党中央和西南执行部呼吁和平，规劝陈、李、白临崖勒马。南京《中央日报》、天津《大公报》、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一齐开火，攻击两广异动，为蒋介石辩护。其中最厉害一着，说两广受日本指使称兵反对中央。上海救国会领导人章乃器仗义执言说：“敌人会花钱来推动一个抗日运动，那简直是笑话”②。全国学联指示各地学联说：“西南尤其是广西，抗日确有诚意，要打击各种对西南歪曲诬蔑的宣传”。进步报刊如《大众日报》、《永生周刊》、《时代论坛》、《救亡情报》、《国难新闻》、《学生导报》、《南方青年》等纷纷发表专论，要求国民党中央接受西

① 刘斐“两广六·一事变”，载《文史资料选辑》第 3辑，第 14页。
② 《全国学联会救亡之基本纲领》。

南的抗战要求，掉转枪口向北方；认为西南出兵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愿望，不应阻止它、诬蔑它，而应督助它、拥护它。蒋介石在全国舆论面前再次受审。

蒋介石使出了杀手锏，用金钱、官位收买陈济棠的部下。他图粤预谋已久，派蒋伯诚为代表常驻广州，广泛接触西南要员，放长线钓鱼。军统局又在香港设立华南区特务机关，专事策反广东陆海空三军，六·一事变后戴笠派郑介民秘密南下主持。据说策反经费高达数百万元，付给空军的钱比购买广东全部军用飞机的钱还要多。7月2日,粤飞行员21人驾机7架脱离陈济棠。6日，粤第二军副军长兼东区绥靖委员李汉魂“挂印封金”，离开汕头到香港，发表反陈通电。8月，粤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由大庾飞往南京，出席二中全会。连续的反陈地震给蒋介石造成有利条件，国民党二中全会召开，拒绝讨论两广提出的与日绝交、宣战等5项提案，相反通过决议撤销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免去陈济棠本兼各职；任命余汉谋为广东绥靖主任兼第四路军总指挥；任命李宗仁、白崇禧为广西正副绥靖主任。同时决议设置国防会议,指定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19人为国防委员。这样做是迫使陈济棠交出军队地盘入京，同时稳住李、白，各个击破。14日，余汉谋在大庾宣誓就职，命令军队南进。陈济棠紧急收缩兵力作内线防御，桂军也派两个师进入北江助战，两军在韶关一带发生激战，无奈陈部发生分裂，将领不愿作战。17日,余汉谋限陈济棠24小时内离境，蒋介石亦电陈急流勇退。18日,粤空军司令黄光锐率全体飞行员分乘62架飞机投蒋。陈济棠见粤局已经瓦解，复电解职，当晚离开广州去香港，应验了“蒋到人去，机不可失”的乩语。陈离穗前召见李宗仁，拨给子弹数百万发和光洋240万元，命陈汉光师开往广西以备东山再起，该师官兵不愿，遂罢。李宗仁亦于18日下午飞返南宁。两广事变的第一幕降下帷幕。

第三节　桂系苦撑危局和事变和平解决

陈济棠在广东迅速失败，粤桂联盟折了一翼，斗争中心转移到广西。按照一般情况，蒋介石可能利用胜利形势和优势兵力，一鼓作气剪除李、白，以竟全功。据说当时蒋介石认为对广西作战有五不可：大致是全国舆论要求国民党政府彻底改变内外政策，团结抗战的呼声高涨，对蒋不利；桂系将领多是患难之交，团结力强，中下级军官出身于南宁军校，对李、白忠诚，策反工作难于奏效；桂军刻苦耐劳，骁勇善战，中央军和邻省军队早已领教过；广西民团训练有年，基层组织严密，后备力量强大；广西地形复杂，多山多水，桂军内线作战，占地利人和等等。因此，蒋怕对桂用兵旷日持久，耽误了西北“剿共”，因为张学良、杨虎诚已有“不稳”迹象。种种原因使蒋适可而止，罢战言和，曾派原属桂系的张定璠去劝导李、白。

李宗仁回到广西，7 月 19 日召集白崇禧、黄旭初等商量对策，为防备蒋乘胜进攻广西，要紧紧抓住抗日这面旗帜不放，即使战败也光荣；同时继续备战，在梧州赶筑工事，宣布戒严。但是考虑到广东新败，广西孤立，难以一省力量和蒋对抗，应谋缓和为上策。故分电吴忠信、张定璠、黄绍竑向南京转达广西抗日主张不变，如中央真抗日，广西将竭诚拥护。并派黄旭初到庐山向蒋表明态度。24 日，李、白联电南京政府，定于 8 月 1 日就任广西绥靖正、副主任，请派员监誓。不料翌日，国民政府下令免去李、白广西绥靖正、副主任之职，另派李宗仁为军委会常委，白崇禧为浙江省主席，特派黄绍竑为广西绥靖主任，李品仙为副主任，处理广西善后。

蒋介石为什么 180 度大转弯？据说是政学系政客杨永泰和蒋的亲信熊式辉跑上庐山献策，说把华北让给日本，还可以借刀杀

人，使日本人消灭共产党，将来还可利用英美力量收回华北。李、白是心腹大患，现在是彻底解决广西的千载难逢之良机，等等①。蒋给他们打动了，改变了初衷，在广州设立行营，调动四五十万军队包围广西，以嫡系卫立煌部从广东北江、连山向广西富川、贺县进逼，以陈诚指挥嫡系第十八军由西江向梧州方向进逼，何健从湖南威胁桂林，顾祝同指挥薛岳、汤恩伯部从黔南威胁桂北，余汉谋一部从广东南路威胁桂东南，又派飞机在桂林、梧州一带侦察骚扰。

李、白接到调令，看出是集架空、离间、逼宫于一体的连环策略，十分愤怒，当即复电指责蒋推翻二中全会决议，自毁信誉，拒绝接受。并连日举行军政首脑紧急会议，决定以破釜沉舟的决心，与蒋周旋到底，用持久战缠住蒋军，使其知难而退。李宗仁又通过设在天津的秘密电台，呼请中共中央华北局给予援助。华北局派薛尚实到广西，建议政治上采取积极攻势、军事上采取守势。李、白根据这一方针，作如下部署。

第一，紧急扩军备战。桂军由原来 2 个军 17个团扩充到 4 个军 44个团。重建十九路军，蔡廷锴捐 30 万元港币作军费，号召十九路军官兵到广西报到，先成立一个师由翁照恒任师长。这样，全省有正规军 10万人，又将全省民团分为“前头”和“后备”两个部分，前者直接参加作战，后者作补充兵员和维持治安。在作战方针上，对滇、黔采取守势，对粤、湘采取攻势。

第二，动员民众参战。在当局的号令下，广西各大城市和县城连日举行群众集会游行，拥护当局的抗战主张，声讨蒋介石破坏抗日，学生纷纷报名参军，民团集体入伍，退伍兵应召归队，3 个星期即完成了扩军工作。南宁、桂林、梧州和前线要地，征调

① 《李宗仁回忆录》下册 673～674 页。刘斐“两广六·一事变”，载《文史资料选辑》第 3 辑，第 19页。

民工赶筑防御工事，举行防空演习。全省呈现出一派抗日救国的动人景象。

第三，巩固内部。桂系吸取武汉事变的教训，1930 年以后建立了秘密的政治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会”，以李、白为正、副会长，吸收忠于李、白的骨干分子参加，约有 500 名会员。这个组织团结了桂系的高中级干部，在两广事变中对付蒋方特务起了重要作用。全体军警人员举行歃血宣誓，誓言说；“在革命领袖领导下，为国家民族之生存而奋斗，不畏难，不退缩，不贪生怕死”①。全省民众纷纷制订《抗日公约》，内容：(1) 宣誓抗日到底；(2) 拥护抗日领袖；(3) 严守社会秩序；(4) 清除汉奸；(5) 不逃避力役；(6) 不购买仇货；(7) 不将粮食器材供给敌人；(8) 不妨碍抗日军活动；(9) 探报敌人和汉奸的活动；(10) 尽力供给抗日军军需”②。

第四，欢迎和邀请各抗日反蒋团体和著名人士来广西共商抗战大计，藉以壮大声势，同蒋介石对抗。并商讨在 8 月 5 日组织抗日军政府，内定李宗仁为主席，李济深为副主席，白崇禧为全军总指挥。

桂系摆出一副决斗架势，在粤桂前线两军时有接触，李宗仁、白崇禧并在南宁举行抗战宣誓典礼。在蒋介石身边，也有陈诚、钱大钧等一批主战派，等待蒋下讨伐令。而蒋介石却采取逼降办法。8 月 1 日，蒋介石复电李宗仁、白崇禧，诡称中央新命，无非爱护李等的革命历史与勋业，解脱其困境，实现国家统一，以便一致对外。又说任命地方官吏，属政府职权，全会亦无不得变更之限制，断不得视为违反决议，违法失信，催促李、白接受新命就职③。

① 《广西政府公报》第 129 期，1936 年 7 月。
② 《广西政府公报》第 131 期，1936 年。
③ 南京《中央日报》民国 25 年 8 月 3 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